

李金銓老師悼念稿

(王亞維)

30 年前即受到啟發

1986 年我剛退伍考入台灣電視公司導播組，那時還是戒嚴年代，電視是壟斷事業，公司節目的選擇相當保守，強調娛樂化，每天關注收視率，內容其次。新聞仍是黨的喉舌，當時社會民主運動風起雲湧，台內對於民主化的理解有很多扭曲，甚至是倒退的觀念。但電視台營收很好，幾乎是暴利，公司裡沒人願意談問題，我心裡有很多苦悶。那時白天參與一個神怪特效的長篇八點檔製作，晚上讀到李金銓老師老師的「大眾傳播理論」、「新聞的政治 政治的新聞」，受到很大的啟發。我終於從局內人看到「社會、媒介、人」三者的關係，了解進步的大眾媒介可以積極介入現代社會的認知、權力與公共生活。對於一個當時在電視台工作的年輕人，期待台灣未來的媒體是很大的鼓舞。

「新聞的政治 政治的新聞」一書的文字很直白，脈絡清楚，大力呼籲解除報禁與言論自由，倡言媒介是社會進步的火車頭，對國內媒體具有強烈的批判與關懷，文字很犀利，旁徵博引中外文獻，我很佩服。我再讀了李老師的「傳播帝國主義」一書，其中增補的第二篇國家發展:電視是塊文化失土?這剛好映照我所服務的電視機構政管商營現況，正是李老師所稱的，結合了黨政軍體系與私人商業勢力，是典型的「官僚商業結合體」。這種下我後來離開，投身公共電視的因緣。後來我曾以筆名在自立早報寫專欄，批判電視台的保守，很多觀念其實來自李老師。後來我們談起此事，李老師說他回國參加“國建會”，王昇曾經召見他，他也擔心自己回不了美國，之後他的筆鋒也沒有停止，可見一個知識分子的勇氣。

成為老學生的學習

三十多年後，我轉到政大傳播學院服務，李老師竟獲聘為玉山學者，研究室先設在新聞館二樓，像是一個從教科書裡走出來的人物竟然出現在眼前，我立刻找機會拜訪，大學者全不見外，初見面就天南地北聊得很愉快。老師當時要在研究所開課，但也生病在控制中，我問他如何來學校，他說坐捷運換公車很辛苦，但為了讓更多學生習得華人傳播的研究取徑，他還是每周早早來政大備課、教學，午餐常常就是吃一個麥當勞的大麥克。而後疫情爆發，醫生不建議他再去學校和人群接觸，他因此一度想辭去玉山學者，我跟老師建議可以在他家上課。疫情期間共兩個博士生選課，一是白俄羅斯的學生皮傑斯，二是老

師的課程助理琪寬，我想既然建議如此，不妨就去旁聽增加人數，李老師說來一起討論，我們在老師家公寓樓下會客室上課，我很幸運得以親炙孺慕很久的大師。

老師治學方法，核心在於「歷史視野、跨學科思考與人文關懷」三者並重。他長期研究國際傳播、中國媒體與新聞自由，一再強調傳播現象不能只從媒體本身理解，而必須放回政治、經濟、社會與歷史脈絡中觀察。因此，他的研究經常結合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與文化研究，形成深厚的跨領域分析能力。這也使得他要求學生的閱讀量非常驚人，尤其強調閱讀經典的重要，主張學生應大量閱讀歷史、語言學與社會理論，以建立宏觀視野與批判能力。從拉茲斯威爾到薩伊德、莫頓，何炳棣到葛兆光，一個月讀大約 10 篇中外文獻、一個學期就讀了 50 篇經典論文，而且每篇都要求學生寫摘要，摘要不得超過 1000 字，除要綜整名家理論，也要提出個人洞見，並提出相關的問題，和文獻對話，每周都讓學生們傷透腦筋。寫完後李老師自己一個字一個字以紅筆批改，他常常說過往學生拿到他改完後的作業，都笑說是「祖國江山一片紅」，但他又說「論文就是這樣，改出來的，多改幾遍，就會寫了」。

老師常說，社會其實是一個光譜，而學術研究就像是一個稜鏡，要把光譜的層次分析出來，遠看天下烏鴉一般黑，但黑白之間其實存在很多灰色。社會現象的原因常不是單因單果，若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則必然有四種可能的邏輯關係：兩者都錯；一個對一個錯；在不同的脈絡或條件下兩者都對；兩者相互支持，一說為主，一說為輔，因此他提倡傳播研究者應具備「對位閱讀」的能力，不能從資料中簡化現象。他也會提醒學術研究要有歷史意識。總是問，你的 claim 是甚麼，說清楚，不要跑馬。要求研究者先理解時代結構與權力關係，再決定研究方法，取得證據，而非本末倒置。

他的治學帶有強烈的人文精神。他長年關注新聞自由、媒體權力與公共利益，上課中一再說學術不只是知識生產，更應對社會現實有所回應。對他而言，傳播研究的目的，不只是分析媒體運作，更是理解人在權力結構中的處境，他一直關心民主，厭惡極權，學術用以維護公共社會中的自由、尊嚴與人的價值。我想這種兼具批判性、歷史感與公共關懷的學術精神，也成為他影響兩岸三地傳播學界的重要原因。

此外，老師也非常擔心台灣學生的國際化能力不足，因此非常鼓勵學生進入全球學術對話，避免只停留在地方性視角。這是他後來把玉山學者的酬勞捐出來成立李金銓教授國際獎學金的原因。

治學態度與生活合一

我們一家人後來常跟彭芸老師、彭懷恩教授夫婦，李老師、顏老師夫婦一起吃飯、喝咖啡，他真是博聞強記，歷史掌故像活字典一般，而且很多是他自己親身經歷。話題也永遠是看了哪些書，那些學者的文章值得細品，哪些報人、記者典範值得學習，他也會批評哪些報人、記者或學者得勢後又前後不一，喪失知識分子的風骨。

七年來他的病情反覆發作，也非常折磨，我看到的他倒是非常堅毅，不管是否出院或化療中，他生活保持一種嚴謹的自律，每天早早起床，運動，閱讀紐約時報等報紙，然後讀書、寫作、改稿，回信。不管順逆，都堅持一個知識分子的身影。

老師 2019 年回來母校後身體狀況不佳，又加上疫情三年，使得他在傳院的影響力沒有真正發揮，我感覺非常可惜。老師選擇身後以植存方在葬在法鼓山園區，不拘泥形式，隨順自然。正如佛法所說：色身無常，但生命意識生生流轉，老師的風範將常在人間。